

走出無依之地：城市的新敘事

■ 梁燕城

本刊總編輯

大城之外的邊緣人

奧斯卡得獎電影《無依之地》(Nomadland)

¹，反映了21世紀西方城市，產生了一批被主流排走的邊緣人，住在旅遊露營車中，到處遊蕩打散工，在西岸荒野中穿州過省，經過一片片的無際荒野，活在一個荒涼無奈的世界。他們過著孤獨的人生，唯一的享受就是觀賞浩瀚的星空、壯麗的沙漠黃昏、冰雪覆蓋的樹林及風濤大海的崖岸。

主角芬恩原本與丈夫生活在「帝國」(Empire)小鎮，作者用這名字似在暗喻原初富足的美帝國，這小鎮原先有一大石膏工廠，工作者聚集定居而成市鎮，統稱公司鎮(company town)，當公司富足，人口增加，但當2007年的次貸危機，2008年美國經濟蕭條，公司萎縮甚至關閉，失去工作的人口遷離，形成一座鬼鎮。芬恩因此失業，芬恩丈夫去世後，陷入悲痛中。於是，她決定變賣部分家當，買一輛露營旅遊車，展開四海為家的流浪打工生活。

帝國輝煌已過，大城市之外的城鎮消亡，其中的市民成為大城之外的邊緣人，已失去工廠或企

業的工具價值，所以他們沒有走向城市，卻在城市之外的荒野中流浪，她沿途也遇到很多同樣生活的人，失去一切之後，浪跡天涯，四海為家。

這反映了21世紀美國新的貧窮人生活方式，一大批無法負擔房子與生活的老年白人，自稱「遊牧者」，是當代駕著旅遊露營車，逐零工而居的邊緣人。原是中產的生活安定工人，因社會變動成為低階的老人勞工，只是以低成本生存方式流浪，保持尊嚴。在主流社會看，這些是被廢棄的邊緣人。

導演是出生在中國的趙婷，並沒有美國左翼的怨恨或右翼的憤激，只是以默默的深情冷眼，描述邊緣弱勢群體的生活，他們如何在無前景的現實世界中，互相關心，欣賞宇宙

之美。電影的氣態是淡淡的哀愁，表達當前美國文化深度的荒涼，美國當今文化漸失去其立國精神的自由理想，反因自由主義過度自由放縱，社會分

摘要：失去整體的宏大敘事，國家就會失去夢想，失去價值方向，城市就會失去秩序、失去靈魂。電影《無依之地》記錄了一批21世紀西方城市中逐零工而居的邊緣人，成為現代工業社會中的「遊牧者」的故事。當今西方政經體制已經失去了整體的夢想和宏大敘事理想，社會失去了穩定性，人在其中像客旅一樣流轉不定，不斷改變工作、家人、居所、價值觀。在特定規則設定下，一些沒用的個人，就變成了社會的廢物。他們的命運，只能是在邊緣地帶遊蕩，成為了西方現代化後期的城市負擔。中國的改革開放吸納了西方兩個世紀以來現代化的優點，融合了中國特有文化及社會主義制度，以人對自己及國家未來的夢想，化解後現代文化的自我中心主義和虛無主義。在中國城市的規劃與設計上，需建立未來夢想的大敘事，應包括建立城市的夢想和市民可參與共同建共用的理想，使市民不分才能和背景，有共參與創造的空間。如此即可擺脫自我中心主義，克服躺平，發揮社會主義的集體智慧優勢，提出共同成功的方向，集體多元創造新成果的發展計劃。

關鍵詞：《無依之地》，液態現代性、廢棄人生、宏大敘事

配越來越不公平，所謂1%的人控制一切財富，使盛世之富足漸衰落。這電影表達美國社會困境中的一些人，在困苦中仍能自覺到人性的價值。

趙婷是以亞洲人的觀察，發掘美國富強外貌背後的貧乏。對美國社會作出溫和而有力的批判，同時仍正面地肯定人性在困苦中，堅忍及彼此關愛的價值，趙婷14歲左右移居西方，在中西兩大文化中遊走觀察，終於發現了西方文化當前的內在荒涼，作出了揭露和批判，並最後肯定了中國文化對人性美善的精神，對受苦者表現了關愛^[2]。

美國夢已成了美國噩夢，西方體制已不能使人實現夢想，個人只能自求多福。

後現代西方社會產生廢棄的人

波蘭裔英國社會學大師包曼(Zygmunt Bauman)提出「液態現代性」(liquid modernity)^[3]一詞，認為如今世界發展出的後期現代性，是使人感到高度不穩定、矛盾和猶豫不決的，他說這是「現代性的混亂化延續」(chaotic continuation of modernity)，社會高度碎片化，像水流迴轉，失去固定性，人在其中像流浪者，不斷改變工作、家人、居所、價值觀，人生沒有安定的獻身，隨著自己的選擇改變，流轉不定，生活像客旅，人生成為自己存在造作出來的監牢^[4]。

針對西方社會的問題，包曼寫《廢棄社會》(Wasted Lives: Modernity and Its Outcasts)^[5]一書，指出西方社會在二十世紀後期，所謂X世代的青年人，罹患抑鬱症的人增加一倍，很多青年一代人被排除於教育和財富的增長之外。他說：「現在的市場更關心的是透過降低勞動成本和資產剝削來增加利潤，而不是創造新的工作崗位和新的資產。在這樣的一個市場中，這些剛剛踏出校門的畢業生所面對的就業前景十分黯淡。」^[6]這年代竟要勸年青人不要期望太高，不要把工作作為人生企劃序幕。這些X世代年青人似被拋棄，「被宣佈為過剩的人，表示你已經被當作廢品處理。」^[7]

他指出，現代性是一個改造現有世界的工程，現代化重視設計一些被認為理應如此的理想，總要發展未來的目標，而為此作出理性的設計，以達至建立優良的社會。包曼指出，「有設計，就有浪

費，……有些人不適合設計的模式，也不能被安置其中，……設計好的形式只能從這些有缺陷的人的不在場或消失中獲益。」^[8]在規則設定下，一些沒有用的個人，就變成廢物了。

由這後期現代性帶來的西方城市及社會發展的背景，西方社會已不再是家庭為單位，而是以個人為單位，在液態化的散漫社會，非菁英的個人被邊緣化，生活是一種流動的方式，無法安定，從一種社會地位轉變到另一種。游牧成為「液態現代性」人的普遍生活特徵，人像旅行者一樣生活，不斷變化居所、工作、配偶、價值觀念，很多個體被邊緣化，被廢棄。由此即可理解電影《無依之地》所反映的問題，不但年青一代，老一代的前中產階層，也變成廢物，如包曼所說：「他們已經被這城市中唯一的遊戲拋棄了，他們不再是遊戲的參與者——也因此不再被需要。」^[9]他們的命運，就是在包曼所謂的「全球邊緣地帶」遊蕩。

這一切來自西方現代化後期，社會文化發展，由個人主義轉向自我中心為本的後現代文化，「液態現代性」(liquid modernity)使社會變成一群無序組合之個體，大批不能擠身富裕上流階層的人，無法安身立命，變成被廢棄者，年青人有些仍未奮鬥，就已放棄任何目標，成為廢青。

老年人被廢棄，仍可隨遇而安，畢竟他們仍有些資財，但年青人一進入社會即被廢棄，怎樣過一生？

西方政經體制失去了整體的夢想

上世紀九十年代，德國思想家貝克(Ulrich Beck)提出「全球風險社會理論」，認為當前現代化發展已進入「二度現代性」，不再相信科技及專家萬能，而是一種「反身現代性」(reflexive modernity)。它是由「自我對抗」和「自我反省」所組成，人們遵循的不再是從前那種按目的理性思考的樂觀模式，而是全盤的反省到人類社會的未來，對未來風險作出評估，以未來可能風險的判斷為基礎，重新去設定現在。

但對個人來說，在資產運用中，風險也可以是機會，高風險可以是高回報，有些人冒風險而成功，攀上菁英階層，但只有少數，不少人失敗，落在

困境中，更有一批不敢冒風險，自動放棄，成被廢棄的散漫人。故貝克指出，現今也是高度個人主義化的社會，我就是我，個人用意志自負風險，個人承擔勝敗。最大困境在，勝利者是少數。

安東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寫《現代性的後果》(*The Consequence of Modernity*)，指出現代時期的知識由專家確定和監控，但至今現代化後期，由於當代社會體系複雜分化，專業知識的本質有不同爭論，專業和專家知識，已無法提供本體論上安全的意義，而使得人面臨風險的抉擇。所謂「反身的現代性」是人只能參照自我來定義自己，人只能為自己負責。

西方後期現代化的社會，是以自我為核心的文化，強調個人權利和自由凌駕一切的價值觀。極度個人自由使人失去了社會性，使人失去整體人類的共同理想。在風險社會生存下的當代人類心理，普遍感到人生存在不安定的內心恐懼。青年人若無法按程式爬上做那1%成功階層的人，就成為散漫困惑的不安無產者，放棄奮鬥，變成廢青，或所謂躺平主義者。這就是包曼所謂的「廢棄人生」(*Wasted Lives*)，是城市的邊緣人，失去一切價值和理想，只是寄居在城市破爛角落的貧窮階層，或躺在父母家中的自我放逐者，成為西方現代化後期的城市負擔，也造成很多社會問題。

西方失去整體的大敘事理想

這種狀況，源自反身現代性的社會，使人轉向自我中心，以自我為本的社會文化，無法建立整體共同理想。

由於現代後期的社會體制，非常複雜和巨大，爬上成為菁英要付很大代價，散漫的個人，要各自冒風險，很多人想逃避艱苦奮鬥，選擇放棄，成為廢棄的人，日本政論家橘玲探討當代先進社會這種處境，使社會產生下級國民，奮鬥為菁英的則是上級國民。^[10]

橘玲指出：「反身性現代社會的另一特徵，就「大敘事」(*Grand Narrative*)的消失。」^[11]本來西方發展現代化，兩個多世紀以來發展出現代文明，在西方是一宏大敘事，西方人以此為榮，也認為自己文明遠優越於全球各文化體系。但自從社會發展

向現代化後期，同時文化走向後現代主義，以自我人權凌駕於所有價值，一切仁愛美善及全體互助精神被邊緣化，社會失去核心價值觀，成為自我中心為本的文明。

西方文化失去了整體的大敘事，青年人陷入性放縱、吸大麻、反奮鬥、反工作、反傳統婚姻、破壞家庭價值的風氣，城市青年人的文化大流，失去夢想，走向廢青主義。當然仍有好些青年努力奮鬥，有理想成為菁英，或成為關愛弱勢者的人士。可惜這種傳統價值並不成為主流。

失去整體的大敘事，就失去夢想，失去價值方向，城市就失去秩序，失去靈魂。

中國建立了大敘事

中國改革開放時，正式自覺地走向現代化，吸納西方兩個世紀現化的優點，但又避免吸收後期現代化產生的問題，並融合中國特有文化及社會主義制度。中國要寫一個全體的故事，發動人民走向新時代的夢想。

中國改革開放時，即開始了一個大敘事，鄧小平說：「不堅持社會主義，不改革開放，不發展經濟，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條。」^[12]鄧小平又說：「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13]鄧小平的改革開放，發展經濟，主要吸納西方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引進外資，以推動解放中國生產力，但同時要求社會主義，去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中國政府對社會的每一步發展，都有周詳而謹慎的計劃和部署，而不走西方放任的自由主義之路。

按這方向落實為制度，1992年10月12日，前總書記江澤民在中共十四大上宣布，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14]。將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同市場經濟相結合，是一種包容多種成分，融合平衡，講市場效率，又追求社會公平的經濟。

這制度的定調，具中國文化的多元和諧特性，中國改變文革時的鬥爭和排他性思維，回歸尋索中國文化的和諧和包容精神，用古智慧將現代化兩大制度方向融合，奇妙地用市場經濟達至經濟

高速增長，又發展社會主義的調節作用，四十年來通過社會主義制度設計逐步打壓了貪污腐敗、平抑了資本主義的豪強壟斷、對付了貧富不公、政商勾結、黑社會勢力及農村貧困等問題。再按中國儒家文化，重建家庭親和、人性美善，又推行法治，防治權貴任意而行。結果創造了另一模式的現代化制度，沒有產生後期現代化的「液態現代性」，沒有變成自我為本的「反身現代性」。因為中國社會整體仍有夢想，人對自己及國家未來的夢想，化解了後現代文化的自我中心主義和虛無主義。

清華大學教授胡鞍鋼論中國走的道路，提綱挈領地說明這中國的大敘事：「我對中國之路的定義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現代化之路』。這條道路的發展包括三個基本因素，是一個不斷增加並相互作用的過程。第一是不斷增加現代化因素，最大限度擴大生產、創造財富，最大限度利用現代知識、科技、教育、文化和信息要素。……第二是不斷增加社會主義因素，發揮社會主義的優勢和政治優勢，共同發展、共同分享、共同富裕。……第三是不斷增加中國文化因素，對構建中國特色的理想社會有重大創新，比如建立小康社會、和諧社會、學習型社會等。……中國在自覺地建設具有本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現代化，自覺地促進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自覺地躋身於世界強國之列。」^[15]

胡鞍鋼提出的中國道路，是三個因素的結合，即現代化、社會主義及中國文化的三位一體結構，這使中國總體方向既包容西方，又不被西方所限，同時融合社會主義體制及中國文化的性質，建立了中國從改革到新時代的大敘事。他所言的現代化因素，包括了市場經濟生產、科學科技知識、文化教育及信息等，亦即西方列強達至富足及進步的原因。他提到社會主義因素，是中國實行的政治社會體制，不同西方資本主義的競爭及弱肉強食，卻重共同發展、分享及富裕，這是西方在資本主義之外的另一體制。還有第三個因素是中國文化，放在當代，是小康社會、和諧社會及學習型社會等，這是中國文化精神與現代社會主義及市場經濟的融合。

台灣中央研究院院士朱雲漢教授公正地研究中國，指出中國發展模式，不單震驚了西方主流經

濟學，也使第三世界思考，「如何在社會公正、可持續發展以及自由市場競爭效率之間取得平衡時，有一個更寬闊的思考與選擇空間。」^[16]他正確地提出，中國的特質是「社會公正、可持續發展以及自由市場競爭效率之間取得平衡」。

西方社會現代化，由資本主義、科學科技及自由主義政治展開，初期曾帶來富強，但後期因自由主義重視個人自由凌駕其他價值，因人各有不同的自由奮鬥後果，成功者富有，失敗者貧窮，產生不公平社會。又因個人權利凌駕一切道德、家庭和社會共同價值，逐漸摧毀家庭和社群，演變成自我中心的文化，自私自利，否定仁愛公義價值。加上全球開拓的新帝國主義，控制他國的資源，利用他國的廉價勞工，使資金外流，形成社會液態化，造成失業貧困大軍，及新一代廢青的無盼望風氣。

中國不同在吸納西方的資本主義、科學科技時，沒有接受自由主義政治，卻用社會主義的理念建立體制，馬克思認為「資產階級社會中個人的自由其實是不受制肘，不受限制的自私自利。」^[17]他認為要由人類的社會(Gesellschaft)轉為社群(Gemeinschaft)，「人們為了最高的目標而團結合作，轉而成為一個民主的國家。」^[18]中國從社會主義思想，是要從社群及人類最高目標講自由民主，而拒絕西方自由主義那「不受限制的自私自利」。中國在發展市場經濟時，用社會主義努力克服資本主義形成的不公平，強調共同發展、共同分享、共同富裕。大原則是鼓勵人人自強的同時，兼重全體公義的體制，群體公義凌駕於個人私利。這就一步步平抑了資本主義的橫徵暴斂，也大力對付了貪腐和黑社會勢力。

中國因看透西方自由主義會形成自私自利的社會文化，在設定發展方向時，重建中國文化價值，重建整體和諧社會及仁愛互助的社群，教育上講人生意義，民族夢想，平衡了市場經濟的自我中心主義。中國吸收資本主義的商業運作及創新動力，但同時馴化了資本主義的見利忘義及自私自利的特質。

這使中國有40多年的驚天動地發展，市場經濟使社會走向富足時，社會主義則用精準扶貧，使貧困基層改善生活，且在全民教育體制下，一面建

立有關愛和感恩的文化，一面創造機會，貧困孩子只要成功入讀大學，可成為專業的中產精英，即可改進上代貧困生活。

這獨特的三結合發展模式，融會市場經濟、社會主義及中國文化，使中國並無變成後期現代化的液態性及反身現代性，也沒有產生包曼所講的廢棄人，持續發展使人人都有機會，有未來的夢想。習近平提出「中國夢」就是「每個人都有理想和追求，都有自己的夢想。……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就是中華民族近代以來最偉大的夢想。這個夢想，凝聚了幾代中國人的夙願，體現了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的整體利益，是每一個中華兒女的共同期盼。」^[19]

城市規劃須有未來夢想的大敘事

中國在成功發展中，全國重要城市都華麗轉身，都市是經濟整合、價值創造及新興產業的平台，必須在規劃與設計上，建立未來的夢想的大敘事，並防範自我廢棄的思想。

中國在成功對付病疫後，卻有人提出躺平主義，2021年4月17日百度貼吧的一個題為《躺平即是正義》的貼文引發熱議，「與其跟隨社會期望堅持奮鬥，不如選擇『躺平』，無欲無求。」「那我可以自己製造給自己，躺平就是我的智者運動，只有躺平，人才是萬物的尺度。」這是一種自我廢棄思想。

原因在中國發展已初步達至富足，社會也充滿機會，但在各機會中達至成功，須經一個奮鬥與競爭過程，特別是讀書從中學到大學，大學後要努力工作或創業。在力爭上游時，人認為應該努力爭第一，達至100分，此中有莫大壓力，也有成敗得失的焦慮。有些人逃避這艱難，就選擇0分，調較心理無欲無求，躺平下來，甚麼都不幹。

中國的躺平，不同於西方的廢棄，西方的廢棄來自現代化後期的社會不公、勞工階層的崩潰，及高度自我中心的化，人是無奈地被社會體系所遺棄了，也因自我怕風險而放棄了。西方社會正疲憊而走向下坡，中國卻在創進性的上坡路中。上坡發展的社會，躺平者是逃避艱辛，選擇放棄。西方是來自太成熟的社會操控，基層人失去機會，中國是

新興社會太多機會，但須不停奮鬥，一些人畏難而放棄。

如何激發畏難者？應考慮發展不同層次的機會，不再是0與100的零和選擇，卻是100分之下，60分之上的各種可奮鬥機會，強調群體共創的成就。共同奮鬥，各自發揮潛能，達至整體成功夢想。在整體發展的成功的，60分與100分的人，是共同成功者，達至共同的富裕和共同的貢獻。所以凡參與者都分享成功的光榮與果實，人人平等，大家不分資質和資歷，共創集體成果。由此可以由人與人的感通關係，為了破除自我中心的躺平主義，中國城市在規劃時，應包括設計建立城市的夢想，並在城市大藍圖中，計劃市民可參與共建共用的理想，使市民不分才能和背景，有共同參與創造的空間。包括：

1. 規劃城市新區的建築及綠色環保佈局，須調查各區民意，下區邀請各區市民給意見，也聘請各區市民參與建設，包括發動社區共繪壁畫或梯級畫，共同種植公園或路旁的花草樹木，共同在節日裝飾每一區，大家參與繪畫和創建美好社區的夢想。

2. 規劃城市的重心經濟發展，建立委員會，諮詢大小企業商人、專家及各區人民需要，了解資源與營商環境，聘請不同學歷及能力的各區人民參與建設經濟結構，以共同繁榮為夢想。

3. 規劃城市的綠化計劃，由專家考察全城自然環境，建立各區諮詢委員會，了解區民對當地自然山、水、石、林等意見，邀請區民參加保育及美化處境，防範污染，以共同融和自然為夢想。

4. 規劃保留城市的歷史文化，由專家掌握全城歷史、文物及文化性格，以城市本身作為一個教育區，去傳述一個城市的靈魂，及其歷史文化的敘事，是全市人民共同參與及共創的，以敘述自己城市的故事為夢想。

若能使平民在實踐上的每一工作、每一生意、每一創作，每一生活動作，都是共同創作城市的理想。在這群體中自我實現，自己的理想同時是社會整體的理想。如此即可擺脫自我中心主義，克服躺平，發揮社會主義的集體智慧優勢，提出共同成功的方向，集體多元創造新成果的發展計劃。

- [1] 香港譯《浪跡天地》，新加坡、台灣譯《遊牧人生》、同時拿下威尼斯影展的金獅獎、金球獎的最佳戲劇電影與最佳導演。
- [2] 趙婷被一些國人批判，因她2013年接受《Filmmaker》雜誌訪問，曾提到對她年少時的中國的一些不滿。我想她是82年出生的年青人，中國改革才剛開始，體制未健全，她少年時經驗的世界，社會仍未發展完善，管理水準不足，故改革初年社會風氣仍有很多問題。她14歲左右就到英國讀書，作為年青人受到另一文化的衝擊，對自己的根源有所叛逆和批判是可理解的。但移居美國後，卻開始深了解美國社會的種種不公平，2015年，趙婷所執導的首部長片《哥哥教我唱的歌》，描述原住民後代生活的困厄。2017年，她的第二部電影《重生騎士》，描述傷殘人的艱苦，至《無依之地》，各片都是對美國邊緣人士的同情。趙婷接受澳洲媒體News.com.au採訪時稱自己在美國感覺像是局外人，沒有「歷史的負擔」，她是要重新在自己的歷史文化找尋價值。她在奧斯卡頒獎禮的講話中，一開始就傳揚孟子性善思想，看來是最後從自己文化傳統中找回價值。
- [3] 這理論可參考Zygmunt Bauman, *Liquid Modernity* (Cambridge: Polity, 2000).
- [4] 同上，第196頁。
- [5] Zygmunt Bauman, *Wasted Lives: Modernity and Its Outcasts*,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04).
- [6] 同上書，引述自谷蕾、胡欣譯：中譯本《廢棄社會》(台北：麥田出版，2019年)，第36頁。
- [7] 同上，第39頁。
- [8] 同注[6]，第68頁。
- [9] 同注[6]，第42頁。
- [10] 參考橘玲、林雯翻譯：《上級國民、下級國民》(台北：先覺出版，2020年)。
- [11] 同上，第169頁。
- [12] 鄧小平：《鄧小平文選》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70-371頁。
- [13] 同上，第373頁。
- [14] 1992年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目標的新選擇，載：人民網2008年09月23日16:09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41129041153/http://30.people.com.cn/GB/122382/8093159.html>
- [15] 瑪雅著：《道路自信，人類史上大國興盛新模式》，(北京：外文出版社，2015年)，第13-15

頁。

- [16] 朱雲漢：《高思在雲：一個知識份子對二十一世紀的思考》，(台北：天下文化，2017年5版)，第152-153頁。
- [17] Grundrisse, trans. M. Nicolaus, *Foundations of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Harmondsworth & NY: Penguin, 1973), pp.163-164.
- [18] Karl Marx, *Collected Works* (Moscow: Proress, 1975), 3:157.
- [19] 習近平：《承前啟後，繼往開來，繼續朝著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目標奮勇前進》，載：新華網2012-11-29 http://news.ifeng.com/mainland/special/xjpmzxx/content-3/detail_2013_06/08/26248131_0.shtml

Exit from Nomadland: the new City's Narrative

Leung In-sing (Editor-in-Chief, Cultural China)

Abstract: In losing the overall grand narrative, the country will lose her dream, lose her value and direction, and her city will lose its order and soul. Oscar-winning film, “*Nomadland*” documents the story of a group of marginalized people living on odd-jobs in the 21st century western cities, as “nomads” in the modern industrial society. Present-day’s Western politico-economic system has lost its whole dream and grand narrative ideal, a society losing its stability. People move around like tourists, constantly changing jobs, family-ties, residences, and values. Certain rulings qualify some useless individuals as social outcasts. Destined to wander merely along the fringes, they evolve into a city burden during the late stage of Western modernization.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up has absorbed the advantages of modernization enjoyed in the West for over two centuries, and has integrated them into her unique culture and socialist system. She has dissolved the postmodern cultural egocentrism and nihilism with people’s dreams for themselves and the country’s future. Chinese city-planning and designing necessitates establishing a grand narrative of urban dreams, inclusive of citizens’ ideals for city-building and functioning. This allowance enables joint-participation and creation by citizens, irrespective of their talents and backgrounds. Hence we may eliminate egocentrism and recumbency, unleashing socialism’s advantageous collective wisdom, propounding the direction for common success, and devising a development plan for collective diversified new achievements.

Keywords: “*Nomad-land*”; liquid modernity; wasted life; grand narrative